

苏轼是著名的大诗人、大学者，他很早就进入了官场。有人说，苏轼是一个优秀的“职场人”。之所以优秀，是因其达观、精进、正直、无私的品德所决定。近日，首届“才高八斗”市全民国学知识电视争霸赛年度冠军罗衡卫做客国学讲座，讲述苏轼的职场个性——

做官准则是以国家和百姓利益为重

■文/本报记者 许珂 图/本报记者 黄沐



苏轼以京官身份从签书凤翔府判官起步，宦海沉浮四十年，直到终老常州。从地方到朝堂，再由朝堂到地方，做过八州知州、三部尚书、一任皇帝大秘书（知制诰），贬过黄州惠州儋州，他把大宋 254 个府州走了个大半，去的地方特别多，上司也就特别多。

那么，苏轼是怎么和上司相处的呢？苏轼的经历又能给我们什么启示呢？近日，首届“才高八斗”市全民国学知识电视争霸赛年度冠军罗衡卫做客国学讲座，讲述苏轼的职场个性。

陈希亮的严厉，让苏轼懂得做官要谨言慎行

苏轼面对的第一位顶头上司是凤翔府的知府陈希亮，他是中国历史上十大清官之一。

陈希亮是皇帝允许穿三品服的四品官（级别很高的一个知府），相当于今天直辖市一把手的级别。苏轼是以京朝官身份到凤翔府挂职当秘书长（“签书节度判官厅公事”）、八品官，级别比陈知府低了很多。

最初，苏轼提出的施政意见，如改革衙前之役、查决囚犯、赈济灾害、修筑东湖，这些都得到了陈知府的支持。然而，让陈希亮万万没有想到的是，他对苏轼的严厉却引起了对方的反感。如，苏轼不参加公务庆祝活动、七月十五中元节不去办公室办公，这些陈希亮都要管，还按照规定扣了苏轼工资津贴——罚铜八斤。最让苏轼受不了的是，苏轼以文章自负，但是陈知府偏偏爱挑他文章的刺。苏轼写的公文，陈希亮毫不客气地在他上面涂改增删，还让苏轼多次返工。每当意见不同时，两人都会争得面红耳赤。

有一次，陈希亮有意要挫这个锋芒太露的后辈的锐气，便有意对苏轼端架子，见苏轼有事要报告，就任他在客座中等候，久久都不出来接见。苏轼心生不平，写诗一首发牢骚并讽刺陈知府：

谒入不得去，兀坐如枯株，岂惟主忘客，今我亦忘吾。

同僚不解事，慙色见髭须，虽无性命忧，且复忍须臾。

苏轼这话说得直截了当，“我来找你汇报，你进又不让我进去，走又不让我走，害得我枯坐

在外面就像块木头。你忘记我了，现在我也忘记你了。我看不惯你的官僚主义作风，也只有气得吹胡子瞪眼睛。等就等吧，反正又不会要了我的命，那就再等一会儿吧。”

还有一次，陈希亮修筑了凌虚台，要苏轼写一篇《凌虚台记》。于是，苏轼就在文中写道，知府啊，你是想建一个台子看西边的山。可是，你看东面，那远处有秦穆公祈年宫、橐泉宫遗址；你再看向南面，远处有汉武帝长杨宫、五柞宫遗址；你再看看北面，远处是隋朝仁寿宫也就是唐九成宫的遗址。别看这些宫殿，刚建成的时候，宏伟壮观，坚固不可摧，现在呢，连破瓦断墙都不复存在，已经变成了种庄稼土地和长满荆棘的废墟了。你现在建造这座高台将来还不是这样，这纯粹是劳民伤财！

陈希亮的态度是，你敢写，我就敢用！苏轼的《凌虚台记》，陈希亮读后，不改一个字，直接命人将它刻在石头上，树立在台子的南边。

苏轼事后也感觉自己过份了，理亏了，于是又写了一首《凌虚台》诗送给知府，诗中歌颂知府风采，委婉地表达了自己的歉意：“才高多感激，道直无往还。不如此台上，举酒邀青山。青山虽云远，似亦识公颜。”

而陈希亮也接受了他的道歉，把《凌虚台》这首诗刻在台子的北边，以供大家观赏。同时也提醒苏轼，做官必须得谨言慎行，特别是一个人要对自己说过的话、写下的文章负责。

清廉的徐君猷，让苏轼明白做官要关心百姓生计

说起苏轼的职场生涯，可谓是一波三折。

在乌台诗案中，苏轼死里逃生，被贬到黄州，这是他人生中的第一个低谷。在看清人世冷暖后，苏轼痛定思痛，开始反思自己的过往，反思自己的为人处世方式，反思自己的人生。

最终，苏轼得出的结论是，自己太过于显露才华，喜欢议论是非，褒贬人物，几十年来所作所为大多犯的是这个毛病。这次遭遇乌台诗案，害得和自己有书信往来的朋友都受到了牵连。所以，苏轼初到黄州，经常是闭门不出，就算是写了什么东西，也不拿出来给人看。

元丰三年二月，苏轼到达黄州贬所，稍后来

黄州任知州的徐君猷对他礼遇甚厚，不以罪官看待他。徐君猷很照顾苏轼，先借他临皋亭安身，又拨给他东坡一块地耕作以养家，还经常请他喝酒品茶。这些，苏轼铭记在心，非常感激，他在给徐君猷之弟徐得之的信中说：“某初谪黄州，举目无亲，君猷一见，相待如骨肉。”

徐君猷关心百姓生计，为官清廉，有益乡间，黄州的老百姓非常感激这位知州。苏轼在《少年游·端午赠黄守徐君猷》，巧妙歌颂了徐君猷的政绩，“银塘朱槛麹尘空，圆绿卷新荷。兰条荐浴，菖花酿酒，天气尚清和。好将沉醉酬佳节，十分酒，一分歌。狱草烟深，讼庭人静，无吝宴游过。”

苏轼在这篇文章中描绘了一幅美景：红色的栏杆外，池塘微波荡漾，荷叶碧绿清新，小荷才露尖尖角。天气清明而暖和的日子里，用兰叶浸水洗个澡，喝着菖蒲花酿的酒。下片则是议论抒情，良辰美景，聚会庆祝端午佳节，喝着美酒看歌舞升平。那不远处的监狱里因为没犯人都长出深草了，公堂上静悄悄的也没有什么刑事案件要审理，大家不妨多多聚会喝酒游玩。

由此可见，徐君猷把黄州治理得政治清明、太平无事。他不用发怒，老百姓也不乱来；他不用多考察，下属也不敢欺瞒。为此，苏轼非常佩服。

元丰五年重阳节前后，徐君猷要离开黄州赴湖南上任，安国寺住持请徐君猷为他们常聚会的安国寺竹间亭取个名字，并题额留念。苏轼考虑到巢谷对徐知州不很了解，于是代巢谷给亭子取名并写了《遗爱亭记》，“未尝怒也，而民不犯；未尝察也，而吏不欺；终日无事，啸咏而已。”

苏轼仅用了二十个字，就刻画出了一个奉行顺应自然、清静无为执政理念的知州形象，他从不迁怒百姓，而百姓也不会违背他的意愿；从不苟责官吏，而官吏也没有欺瞒他。寥寥数语，一个不折腾、不扰民、深得百姓拥戴的好官形象就跃然纸上。

苏轼的做官准则是一心为公、不阿权贵，以国家和百姓的利益为重

按道理，苏轼在黄州反思这么久，应该吸取教训，夹着尾巴做人了吧？没有。苏轼是一个耿直的人，率真正直，一心为公，仗义直言，只要他觉得你说得不对或做得不对，他还是会据理力争，爱憎分明又口无遮拦，秉公直言又不看场合，急公好义又不计后果，有时忍不住要批评甚至讽刺人，说话写文章由着性子来。苏轼说自己这一点他改不了，无可救药。

世界读书日

编者按

4月23日是世界读书日。中华文明素有热爱阅读、尊重知识的传统，古人敬惜字纸，一片写有字的纸页也不忍废弃，而书本更是具有神圣的意义。正是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对于读书的重视与热爱，中华文明才能赓续不断并在新时代发扬光大，本期国学专版特别刊发此文，意在以古人之开卷有益启发今人手不释卷。



古代社会，不同职业和不同阶层的人，在喜爱读书、热爱学习上取得了超越时空的共识。他们遨游于知识的海洋，驰骋在思想的疆场，从书中开拓了眼界，感受到文字的力量，学习到修身的方法，掌握了治国济世的智慧……古人之重视读书，正可以激励我们奋发图强、手不释卷。

百姓重视读书

汉朝的匡衡，出身贫寒，在没有做官之前，勤奋读书，非常重视学习。当时，他很穷困，但想尽各种办法去争取读书的机会。匡衡白天工作，晚上想看书，“勤学而无烛”，乃穿壁引其光，以书映光而读之”。他在为当地富人打工期间，“佣作以给饮食”，但他不要工钱。富人非常奇怪，问他为何不要工钱。深知富人家多藏书的匡衡说：“愿得主人书遍读之。”富人非常感动，“资给以书，遂成大学”。通过积年努力，匡衡成为了西汉有名的经学大家。时人有云：“无

说诗，匡鼎（鼎是匡衡的小名）来。匡说诗，解人颐。”

北魏的祖莹，出身富贵，也非常喜欢读书。他读书“以昼继夜”，其父母“恐其成疾，禁之不能止”。他在父母入睡之后，“燃火读书，以衣被蔽塞窗户，恐漏光明，为家人所觉。”此举既使自己能继续读书，又能不影响父母、避免让父母操心，可见其用心良苦，时人称其为“圣小儿”。

明末清初有个叫唐铸万的人，做过十个月知县，而后辞官来到苏州，成为一介布衣。他生活非常拮据，常常断炊，以废圃中枸杞叶为饭，“衣服典尽，敝絮蓝缕”。在这种境遇下，他仍然能够安贫乐道，以读书写书为乐，“陶陶焉振笔著书不辍”。

匡衡、祖莹、唐铸万应说是幸运的，历史留下了他们的名字，实则还有亿万热爱读书的普通百姓，虽然没有留下名字，却同样值得尊重。正是一代又一代热爱读书的普通百姓接续传

世界读书日

承我们的文化，我们的文化才能历经五千年而不绝，并始终有一股来源于普通百姓的力量注入其中，使其活力无限。

学者重视读书

普通百姓尚且重视读书，何况学者乎？然而有的学者成名之后，就不再读书了，半途而废，殊为可惜，当以为鉴。明末清初的顾炎武，开启有清一代学风的大学者，一辈子始终读书且卓有成就。因其出身富户家庭，顾炎武有很好的条件读书。他遍览前朝史籍，悉研各类经典，为其形成渊博的知识体系奠定了扎实基础。梁启超在《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》中称赞道：“亭林（顾炎武之别称）之好读书，盖其天性。”顾炎武为了撰写《天下郡国利病书》，“凡阅书一千余部”。顾炎武曾游学大江南北，在考察各地的过程中，他结交豪士，获悉各地山川风俗，他的亲身经历连同书本知识共同构成了著书材料的来源，这也绝非书斋中的学者所能及的。

“君子之学，死而后已”成为顾炎武一生坚持读书学习的真实写照。潘次耕在《日知录序》中说：“先生精力绝人，无他嗜好，自少至老，未尝一日废书。”他在读书为学的过程中，认为人格塑造是道德文章的基础，健全的人格至关重要。他钦佩袁舜的“耿介”，愿意将自己身上的“胸中磊磊”发扬光大。他提倡要用谨慎和虚心的态度去对待读书为学。关于谨慎，他说：“著述之家，最不利乎以未定之书传之于人。”当别人希望刊刻他的《日知录》时，他谦虚地回答，该书还有许多地方有待提升与完善，尚需一段时间。而关于虚心，他说：“人之为学，不可自小，又不可自大。”阎百诗针对他的《日知录》提出若干条建议，他欣然接受。

清代大学者戴震，一生与书结缘。出身于商人家庭的戴震，自幼喜欢阅读各类书籍，而且喜欢探求事物背后隐藏的真理。段玉裁在《戴东原先生年谱》中形容戴震“盖聪明蓄著者深矣。就博读书，过目成诵，日数千言不肯休。”难能可贵的是戴震在求学时即表现出刨根问底的探究精神。洪榜在《戴东原先生行状》中说：“先生读书，每一字必求其义。塾师略举传注（古人注释经典的作品）训解之，先生意每不释然，师不胜其烦，因取汉许叔重《说文解字》十五卷授之。先生大好其书，学之三年，尽得其节目。又取《尔雅》《方言》及汉儒笺注之存于今



罗衡卫

所以，苏轼和上司相处的情况整体上不太顺利，不太和谐，他和司马光的一次冲突很能说明这一点。

正义感爆棚的苏轼任职期间，常常和执政的宰相们过不去。王安石的变法措施过于激进，苏轼反对王安石；司马光要全面废除王安石的新法，做法极端，他又反对司马光。苏轼认为新法有的条款好，不应该全面废除，为此在朝堂上和司马光争执，甚至讽刺宰相司马光。

苏轼说，司马宰相，你这个做法是王八踢腿。（“相公此论，故为鳖厮踢。”）

司马光问，王八怎么能踢腿？

苏轼说，王八不能踢腿，它就乱来啊，和你一样，折腾啊！

司马光听后，气得脸都绿了。

眼看宰相司马光要发作，苏轼说，你以前和韩琦争论，可以把唾沫溅到他脸上都没事，现在你做了宰相，难道就不允许我和你争论啊！

他这样一说，司马光不好发作。但是，不管苏轼说什么，司马光不听。

这让苏轼无可奈何，气得苏轼朝着司马光的背影直摇头：犟死了，你不是司马光，你简直就是司马牛！

苏东坡就是这样一个人，一心为公，不阿权贵，只有国家和百姓的利益，没有个人利益，不会

因为司马光提拔自己就支持司马光废除全部新法。

总的来说，虽然苏轼饱经磨难一生坎坷，但他也名满天下且流芳百世。

从辩证的角度看待苏轼的耿直多言，往好处看，是仗义执言有君子之风，批评人一针见血机智幽默，是个幽默风趣的段子手；往坏处看，苏轼“以高才狎侮诸公卿”，批评这个批驳那个，甚至给人取外号，批评只求轰动效应，不尊重说话的对象、不考虑对方的感受。

苏轼的好逞口舌之快让他吃尽了苦头，这一点，人们无不为他感到遗憾。两个皇帝都能够了解苏轼，而苏轼终究不能被重用。仁宗看了苏轼兄弟的文章，认为自己为子孙得到了两位宰相之才。神宗尤其喜爱苏轼的文章，在宫中阅读，御膳送来竟忘了吃，称他为天下奇才。《宋史》的编撰者不无遗憾地写道：苏轼的天才是不可被掩盖的，这是天下最公平的事，做不做宰相那是命。唉！苏轼不能做宰相，又难道不是他的幸运吗？但是，“有人认为苏轼的说话做事如果能够谨慎一点，收敛一点，不要那么锋芒外露，虽然没有受到重用，至少不会惹祸。不过，苏轼如果真能做到这一点的话，那还算是苏轼吗！”“或谓轼稍自韬戢，虽不获柄用，亦当免祸。虽然，假令轼以是而易其所为，尚得为轼哉！”（据《宋史·列传九十七》）

古人如何读书？

者，搜求考究。一字之义，必贯群经，本六书（造字与用字的六种方法）以为定诂。由是尽通前人所合集《十三经注疏》，举其辞无疑，时年先生十六七矣。”

乾隆二十年（1755年），戴震在北京纪昀家中住，一方面当家庭教师，一方面从事学术研究。在此期间，他写成了《周礼太史正岁年解》等书，名扬天下。后来，他离开北京，在扬州、保定等地为学。乾隆三十八年（1773年），乾隆下令开馆纂修《四库全书》，纪昀被任命为总纂官，他向皇帝推荐才华横溢的戴震为纂修官。戴震在纂修官这个职位上干了四年，主要校勘天文地理、语言文字等方面的书籍，宋儒张载言学者要“为往圣绝学”，天文地理、语言文字之书堪称绝学，这些书籍之难度足以使一般学者望而却步。梁启超说：“四库全书天算类提要全出其手。”倘若戴震没有常年读书的积累，没有深入的思考，是断不会有其学术事业上的大丰收。

官员重视读书

古代学者往往具有官员的身份，正所谓“学而优则仕”。官员重视读书，一来可以从书中获得处理政务的经验，二来通过读书砥砺品德、提高修养、教育子孙。

乾隆时期的名臣汪辉祖在为官生涯中非常重视读书。他在《佐治药言》中指出：“遇疑难大事，有必须引经以断者，非读书不可。”这是他将读书与做官紧密结合后得出的结论。这个结论在他的为官生涯中得到了印证。他在乌程当幕僚的时候，遇到一个案子：有一个姓冯的人，由于本宗没有人可以过继给他为子，他就自行收养了他姑母的孙子当自己的儿子。等到这个姓冯的人去世后，一个同姓但不同宗的人却出来争着充当他的继承人，太守竟然同意了这人的要求。汪辉祖辅佐佐长官重新判这个案子。刚开始的时候，他也没有思路。但是通过读书，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关键。他看到宋儒陈淳在《北溪字义》中提到同姓同宗是解决此类问题的关键，通过引经据典，汪辉祖“绝其争端”。

因《颜氏家训》而名垂千古的颜之推曾历仕四朝，他自幼爱好读书，又生逢乱世，自身成长经历与时代动荡际遇让他明白只有读书才能获得永恒。当他的长子颜思鲁对他说，我们家没有显赫的家世，没有雄厚的钱财，我当儿子的，理所当然应该做的就是挣钱养家，您成天告诫我读书学

习，这有什么用呢？颜之推对此进行了深入思考，他认为读书的价值胜过为生计奔波的价值。他在《颜氏家训》中告诫自家子弟：“自古明王圣帝，犹须勤学，况凡庶乎。”在颜之推看来，帝王追求学问树立了榜样，自己为官拥有一定条件，更要让孩子养成读书的习惯。颜之推结合自己的经历，希望孩子能够初学《诗经》《论语》，所谓学《诗经》利口舌，学《论语》明志向；继而读《礼记》《左传》，所谓读《礼记》以修身，读《左传》可以鉴史知今。颜之推认为：“父兄不可常依，乡国不可常保，一旦流离，无人庇荫，当自求诸身耳。”而读书正是“自求诸身”的不二选择。

帝王重视读书

上文颜之推云：“自古明王圣帝，犹须勤学，况凡庶乎。”古代重视读书热爱读书的帝王不少，而清代的康熙尤可称为榜样。

《清史稿》评价康熙“圣学高深，崇儒重道”。他之所以能够有这样的成就，就在于对书籍与学习近乎痴醉的追求。康熙从思想层面上很早就认识到研习儒家经典的重要性：“帝王勤求治理，必稽古典学，以资启沃之益。”康熙不仅在思想上非常重视学习儒家经典，还身体力行地主动学习儒家经典。青年时期的康熙不仅早起用功读书，“逐日未理事前，五更即起诵读”，还能在政务繁忙之余通过经筵日讲等制度深化学习，正如他所言：“朕于政务余闲，惟日研精经史。”

康熙读书之辛苦令人同情，他在《庭训格言》中叙述自己有时政务处理完后继续读书，“竟至过劳，痰中带血”，但也因此没有因此废弃学习。康熙读书之痴迷令人钦佩，在巡幸塞外时，非常想看曾经用心朱批过的《资治通鉴》《纲目大全》等书，但因为这些书“卷帙繁多”，“未携至此”，建议随驾诸臣“其各以所携书籍进览”。随驾诸臣以《通鉴》《文选》诸书呈进”后得到康熙“甚善”的评价。康熙由此不忘告诫诸臣：“凡文武各官，皆须读书，于古今得失，加意研究。”康熙由此得到“自古帝王好学者，远不能及”的高度认可和评价。

今天我们身处市场经济与知识大爆炸的时代，不少人产生了一种颇为消极的情绪：读书有什么用？反正也读不了那么多书。实则，这个时代不仅需要我们读书，而且需要我们有更宏大的眼界，用更高效的方法去读书。古人尚且手不释卷，今人哪有舍弃书本的道理？

（据《中国纪检监察报》）